

編後語

今年，兩位最擅長寫奧斯維辛遭遇的諾貝爾獎得主凱爾泰斯(Imre Kertész)和維瑟爾(Eliezer Wiesel)先後離世。他們終身以書寫守護集中營的記憶，警惕世人莫要遺忘這段血腥歷史。無疑，奧斯維辛不單是倖存者個人的痛，也是歐洲乃至整個西方文化的痛。即便如此，二戰迄今，對奧斯維辛悲劇的反省從未稍歇，由此發展出以不同學科探究這個現象的大屠殺研究，成果甚豐。對比中國，由於大家都能懂的原因，對半世紀前發生的文化大革命仍然諱莫如深，更遑論公開、自由地研究。五十年過去，認真看待這段歷史並進行反思，似乎是拯救文革真相的第一步。

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聚焦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道德正當性和文革的歷史效應。秦暉提出的問題是，不管毛發動文革的目的多麼高尚，都不能證成其所使用手段的合法性。秦文釋讀毛在文革期間如何翻雲覆雨，為求無限權力而不擇手段，是釀成文革一切災難的主因。魏格林、崔金珂則以宋彬彬道歉事件和「五二」紅歌會為例，指出文革記憶再一次成為當年參與者相互競爭的戰場，而造成這種結果的關鍵是1981年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此後的黨史編纂學。兩篇文章讓我們看到，當代中國對社會公正、政治正確、未來的認知仍受着毛時代、尤其是文革的影響。

很長一段時間，文革研究的焦點集中在精英政治、城市中的派性衝突。但近年，隨着學者努力挖掘地方檔案材料、進行田野調查，又或是對親歷者進行口述紀錄，文革研究無論從選題乃至方法都有很大突破，視野從城市延伸至農村，範圍亦從政治擴展至經濟、藝術、日常生活等所謂「第二社會」。「學術論文」和「景觀」刊登的四篇文章，多少反映這種趨勢。楊繼繩關注文革的國民經濟狀況，由於當時發展經濟的總綱是「抓革命，促生產」，而具體開展辦法則在「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由此導致人民陷入極度貧困，這一切惡果皆源於排斥市場的計劃經濟體制。陳意新則關心文革時期遠離政治中心的農民為何造反，「四清運動」是回答這個問題的鎖鑰。透過安徽的案例，他的結論是，當時農村並不存在學者所認為的「人民的文革」。孫沛東以京滬城市幹部和知識份子兩個階層的子弟為研究主體，重描一代人的閱讀狀況，指出他們的閱讀行為其實包含了重新確認文化價值和文化資本積累的雙重過程。王愛和曾是北京無名畫會核心成員，她提供寶貴的一手材料，再次呈現這個群體的精神面貌；同時，無名畫會以及其他地下群體的存在，突顯了黨國體制下的社會能動性潛流，為公共歷史打開另類的想像空間。

兩期文革專號終於編完，今昔相照，感慨繫之。凱爾泰斯的兩句話頗堪玩味：「萬籟皆暗，只有那些說話的人才有真理。」但願我刊不辱亡者、不負時代。